

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 新制度典範分析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研究中國的模式從「極權主義」、「多元主義」到目前方興未艾的「新制度主義」分析等歷經了幾次的典範轉移。「新制度分析」除了對特殊制度安排的重視外，還主張研究焦點應從黨國精英轉移到社會經濟網絡、市場、地方政府與新興利益團體等。在學科分際上，由於二十年來中國制度變遷的根源是經濟改革，但因為社會主義實踐所留下的制度遺產，使得黨國勢力的「慣性」仍很強，再加上傳統文化的制約，使得經濟運作中存在著許多非經濟因素，故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自然成為學者觀察中國制度變遷的工具。八〇年代以來，西方中國研究的議題多集中在改革路徑的選擇、鄉村工業成長的動力、經濟改革與社會後果、國家—社會關係以及中國政治發展前景等，不僅成果豐碩，且與社會科學理論形成一種辯證性的對話，對國內中國研究而言，亦具有積極的示範作用。

關鍵詞：典範轉移、極權主義、多元主義、新制度主義、制度轉型、國家—社會關係、中國中心主義

* * *

一、前言

自從埃德伽·史諾（Edgar Snow）報導「紅色中國」以來，美國和中國、亞洲的關係在整個世界的大動盪中發展演變，從四〇年代的大戰峰煙，五〇年代的冷戰對立，六〇年代的左派思潮和造反意識，七〇年代的東西方僵持和三角關係，八〇年代的政治波動，一直到九〇年代從亞洲捲起的民主、經濟發展大潮^①。就中國大陸內部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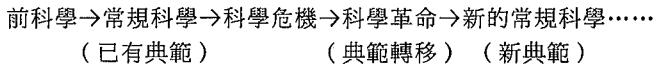
註① Steven W. Mosher, 美國新一代中國大陸問題專家（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頁二。

看來，五〇年代向蘇聯的「一邊倒」，六〇、七〇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七八年開啟的改革開放政策，皆吸引了無數西方學者對中國的關注，而美國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亦隨著此客觀形勢的發展而變動著。

綜觀美國的中國研究，有一極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具有相當強的「理論方向性」，其將中國放到各自的專業學術領域中進行研究，學者不斷嘗試社會科學發展的最新趨勢，發掘新的分析模式與方法論。半個世紀以來，其研究重點和方法都經歷了諸多變化。尤其是進入七〇年代以來，陸續建立了一批關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結構的理論模式。對於這些研究發展和變化，一些美國學者自己曾做過一些批評性總結，例如：馬若孟（Ramon Myers）和墨子刻（Thomas Metzger）在《漢學的影子》（*Sinological Shadow*）這篇論文中尖銳地批判美國的中國研究。白魯恂教授（Lucian Pye）在一九八一年著作《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中建立自己模式的同時，進一步指陳其他模式的缺失^②。何漢理教授（Harry Harding）又於一九八四年著文認為美國對當代中國大陸的研究已進入第三個時期，並對在此之前理論模式進行了分類和批評^③。歐邁可（Michel Oksenberg）在劍橋中國史中按各個領域題綱挈領地總結了美國的中國研究。沈大偉教授（David Shambaugh）於一九九三年所主編的《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④一書，更進一步標誌了美國對當代中國大陸模式研究的總結和發展。

另外，就學科分際而言，還有以中國近代史研究為中心試圖進行綜合分析的柯保安（Paul Cohen）的著作，有以費正清（J. Fairbank）為論述中心而歸納美國中國研究的艾文斯（Paul M. Evans）的著作。就學科分際的角度而言，還有詹隼（Chalmers Johnson）與何漢理從政治學領域、柏金斯（Dwight H. Perkins）從經濟學領域以及魏昂德（Andrew Walder）從社會學領域歸納了美國的研究狀況和問題等。

孔恩（Thomas S. Kuhn）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⑤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典範（paradigm）轉換論。他認為科學發展的模式如下：



在孔恩看來，科學發展就是從一種科學研究傳統過渡到另一種科學研究傳統，常規科學的研究活動是由典範來指導的。不同的典範規定著不同的常規活動，科學革命其實就是典範的轉移。隨著後冷戰時代的來臨，西方學者對於國際新秩序的問題正集中於「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探討。而西方對中國大陸這個被喻為「社會主

註② Lucian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Publishers Inc., 1981).

註③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Jan. 1984, p. 286.

註④ David Shambaugh,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註⑤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義的最大實驗場」的研究，亦隨著國際政經格局與改革開放後客觀形勢發展的推移，產生了「模式轉移」(model shift)的需求。

半個世紀來，西方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歷經了不同階段的變化，亦產生了方法論典範的轉移，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多元主義」(pluralism)到目前方興未艾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史塔克(David Stark)與倪志偉(Victor Nee)在《邁向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分析》一文中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構有其自身的制度邏輯與發展動力，故必須對傳統的極權主義與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分析架構加以檢討，而採用所謂的「新制度分析」，除了對特殊制度安排的重視外，還應將研究焦點從黨國精英轉移到社會經濟網絡、市場、通俗文化、企業、組織創新、政治聯盟、地方政府與新興利益團體等^⑥。

針對此，本文首先從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角度討論不同研究模式的利弊與典範轉移的背景系絡，其次歸納八〇年代以來，西方中國研究的主要議題，包括改革路徑的選擇、鄉村工業成長的動力、經濟改革與社會後果、國家—社會關係以及中國政治發展前景等。在學科分際上，二十年來中國制度變遷的根源雖是經濟改革，但由於社會主義實踐所留下的制度遺產，使得黨國勢力的「慣性」仍很強，再加上傳統文化的制約，使得經濟運作中存在著許多非經濟因素，故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自然成為學者觀察中國制度變遷的工具。就此而言，西方中國研究在不斷與社會科學理論進行辯證性的對話下獲致豐碩的成果，不論對大陸或國內中國研究者而言，均具有積極的示範作用。

二、傳統模式的特點與缺陷

十六世紀在西方興起的「漢學」(Sinology)，亦稱為「中國學」，指的是西方人從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等各方面研究中國的學問，但經過時空的演變，此種以歐洲國家為大本營的研究被蓋上「過時」的烙印，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其完全打破漢學狹隘的學科界限，而是將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方法融入研究之中，從而開展了研究者的視野，豐富了研究的內容^⑦。

根據趙文詞(Richard Madsen)的觀察，美國社會學界中對中國「國家—社會」研究所描繪出中國圖景的變化，其不僅是中國社會變遷的直接反映，而是理論、數據和輿論三方對話的結果，而此種輿論符合了高德納(Alvin Gouldner)所謂的「學術研究的潛存氛圍」(metaphysical pathos of research)，此氛圍能影響研究議題、限定研究範圍並影響研究資金的分配^⑧。除此之外，當代西方尤其是美國在中國研究的轉折變

註⑥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Toward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tate Socialism," in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0.

註⑦ 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一二。

註⑧ 趙文詞，「五代美國社會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收錄於涂肇慶、林益民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三七。

化，主要受到以下幾點因素的影響：(1) 國際政經結構格局 (2) 中國大陸的政經社會變化 (3) 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科學界，特別是政治學界方法論潮流的變化趨勢 (4) 研究者所處國家的政治動態與學術資源分配。

美國對中國研究從事較有系統的研究，始自五〇年代，主要是基於安全的考量，時值冷戰方殷，美國必須對以蘇聯為首的共黨陣營進行瞭解，以為因應。一九五八年「當代中國委員會」（Contemporary China Committee）成立，其標示了未來美國高等學府對中共研究的興趣，也為中國研究打下了基礎。而來自政府和民間基金會用以協助中共研究的費用^⑨，不但在十數所主要大學成立「中國研究中心」（China Centers），更在其他大學中加開有關中共研究的語文、文學、歷史和政治等方面的課程，使得美國的亞洲研究，不再侷限於「日本研究」一隅。深究其中，有一極為突出的特點，就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具有相當強的「理論方向性」，其把中國大陸社會放到各自的專業學術領域中研究，學者不斷嘗試社會科學發展的最新趨勢，發掘新的分析模式與方法論。

就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從五、六〇年代至今歷經了幾次的典範轉移^⑩，這不僅是隨著中國大陸客觀發展情境而轉移的，其與西方社會科學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嬗變、與其他區域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東歐蘇聯研究）進行對話以及國際與美國國內政經局勢亦脫離不了關係。

(一) 極權主義模式（二次戰後——文革爆發）

五〇年代，冷戰方殷，兩大集團間的對抗，中共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政治制度與計畫經濟體制的移植使其被貼上「蘇聯式」的標籤，再加上資料蒐集的困難，西方研究中的「克里姆林宮學」自然而然地被移植到中國研究上。而戰後美國國內，由於「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所導致的一股反共風潮，更對此種研究趨向有加乘的作用。此時期的研究典範為「極權主義」模式；極權主義是冷戰時代的產物，主張共產主義與一九三〇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如出一轍，其統治特點如下：(1) 有一官定意識形態；(2) 由一魅力型領袖所領導的群衆性政黨；(3) 恐怖的秘密警察控制；(4) 國家壟斷所有的大眾媒體；(5) 黨國對軍隊的掌控；(6) 中央指令性經濟^⑪。

在此典範影響下，西方學者賦予中國政治神秘且負面的形象，再加上韓戰爆發，中共公開與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更對此種形象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時期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共黨國組織、意識形態與毛澤東思想及其本人等，何漢理稱此時期的研究

註⑨ 民間基金會中贊助最多者為「福特基金會」。見 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Area Studies," in Lucian W.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0.

註⑩ 可參見：李英明，中國大陸學（台北：揚智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

註⑪ 參見：Carl Fitzgerald and Z.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3).

者為「第一代」(the first generation)，這個初始階段的主要著作有萊維斯(John Lewis)的《共產中國的領導權》(*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1963)、舒曼(Franz Schurmann)的《共產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1966)、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毛澤東》(*Mao Tsetung*, 1966)、包大可(A. Doak Barnett)的《共產中國的幹部、官僚和政治權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1967)、陶森德(James R. Townsend)的《共產中國的政治參與》(*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67)以及傅高義(Ezra Vogel)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東》(*Canton Under Communism*, 1969)等等^⑫。

第一代的中國研究，存在著幾個特色^⑬：

1. 研究範圍十分寬廣：如舒曼在一本書中就探討了意識形態的內涵、中共的政黨結構、政府的組織與運作、官僚體系的管理與控制、工廠管理、城市政治及鄉村建設等衆多問題；
2. 這些研究以描述性的工作居多，出現概念化不足(under-conceptualization)的問題，其並未企圖建立有關中國大陸當代政治研究的一般理論或模式，或與其他共產體系作比較；如傅高義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廣東》一書序言中就表明，他只是在寫廣東省的「社會經濟史」；
3. 資料來源主要是依靠中國大陸官方渠道，故許多作品與其說是對中共政局的分析，不如說是對於中共官方教條的註解與說明；
4. 由於研究資料的限制，而且屬於起步性的研究，所以有許多作品有明顯的過度通則化(over-generalization)，或以偏概全的問題，忽視了組織之間、部門之間乃至於地區之間的差異；

總體而言，五、六〇年代美國學者的中國研究並不成熟，其將任何研究重心集中在以中南海為核心的黨國機器上，而政策輸出亦視為依從一個由上而下，以中央政府為分析重心的框架，其中，權力單向的、從上而下的流向被視為自然的正常狀態，當權力出現從下而上的「逆流」時，國家的整合便被視為出現了問題。但由於種種主客觀環境的限制再加上文化上的差異，這種研究缺陷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費正清所言：「當我們對一種外國文化還不理解時，似乎有人在譴責我們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而「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是中國研究的一條死路，但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⑭。

(二) 多元主義模式（文革爆發——毛澤東過世）

就六〇年代後期的時代背景而言，「越戰」與「文革」皆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了強烈的衝擊與震盪。在對越戰的反思中，美國學界意識到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y*)是防止歷史悲劇(美國介入越戰)重演之理智作法，而放棄以西方歷史經驗為

註^⑫ Harry Harding, *op. cit.*, p. 286.

註^⑬ Harry Harding, *op. cit.*, pp. 286~290.

註^⑭ 柯保安著，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三九八。

標尺去衡量研究對象，正是研究的起點^⑯。此外，中國大陸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造成嚴重的衝擊，也給美國的中國大陸研究帶來了新的轉機。紅衛兵報刊和傳單等的大量出現，為這種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全新資料，揭開了中國大陸官方政治的神秘面紗。更重要的是，文革作為一種未曾預料的史無前例現象，亟待學者們的認識與解釋。文革的發生，使西方學者了解到中共並非如第一代研究者所假設的：領導層是統一的整體，組織結構具有穩定性。相對地，精英間的互動與社會各階層間均存在極大的衝突，因此而對「極權主義」模式帶來衝擊。

上述的理解與當時西方學術界所風行的行為科學革命是離不開的，有些學者接受了紅衛兵的說法，而對中共研究採「兩條路線鬥爭」（two-line struggle）模式，有些學者則從毛掛帥途徑（Mao-in-command approach），另有些則是從派系模式（Factional Model）、世代模式（Generational Model）、利益集團模式（Interest Group Model）及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等對中共進行研究，此亦標示著西方中國研究進入「第二代」（the second generation）。我們可以將文革至毛澤東過世這段期間稱為「多元主義」（pluralism）典範，最能表現這種學術取向的例子為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派系模式在中共政治的運用」^⑰與鄒讐的「中共政治中的非政治團體研究導論」^⑱等論文。

第二代的學者有以下特點：(1)開始注意中共政治中的「非正式」的部份，亦即不再局限於正式的中共大會及中央委員會；(2)開始注意中共內部的差異性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謬誤，如：注意分析不同的公共政策領域、研究不同的城市或省分的差別及探討不同歷史時段的歧異；(3)在第一代研究的基礎上，開始作概念建構的工作。

當然，第二代的中國研究亦不無缺點，其中重要者如下：

1. 中國研究在美國的學術界中相對孤立，與整個比較政治學門的整合不足；
2. 此時期的研究議題與方向受到文化大革命極大的影響，毫不批判地接受毛主義（Maoism）解釋文革的起源、目標與結果^⑲；
3. 多元主義過於化約，容易將焦點集中在政治的特殊性，而忽略了正式組織運作以及結構制度面的因素。

高德史登（Avery Goldstein）在其從扈從到權力平衡政治（*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一書中，總結了西方前二代研究方法的問題，其指陳極權模式與多元主義模式等傳統研究途徑的盲點：

1. 很難界定出應用的適度範圍，甚至僅就表面來看，似乎也只能用以解釋說明某

^{註⑯} 侯且岸，前引書，頁九四～九五。

^{註⑰}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3, 1973 (January-March), pp. 34～66.

^{註⑱} Tang Tsou, "A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65).

^{註⑲}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op. cit.*, p. 25.

個階段的現象；

2. 這些研究途徑多犯了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毛病。除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差異外，他們的研究都隱含以下邏輯：從行為者的特質或互動過程來解釋政治結果，忽略情境結構對行為者的影響。當情境結構一改變，相同的行動者參與類似的互動過程有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行為模式與結果^⑯。針對此，作者揭露其「結構」研究途徑，以中國政治發展為個案討論扈從與權力平衡兩大理論（比較如下表）。

項目	扈 從	權力平衡
時 間	1949~1966	1966~1978
政治秩序	層級節制	無政府狀態
權力分配	集中在少數領導人	多元參與
功能分化	低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在概括並反省了前二階段的研究後，何漢理提出了他個人對於第三代中國研究應該致力的幾個方向：第一，中國大陸目前出現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即改革開放，而且這個發展亟待人們去作深入的探討。第二，由於中國大陸的開放，因此研究者在資料來源上不僅極為充裕，甚至可作深入的田野調查與檔案研究。第三，新一代的學者應致力於將過去研究的各種模式作分類、檢驗及綜合的工作。第四，中國研究應與比較政治學門作更全面且深入的整合。第五，科技整合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對於未來中國研究應是不可避免的方向^⑰。

三、新制度主義的興起

文革的發生成為西方中國研究告別黨國一體「極權主義」模式的轉捩點，同樣地，一九七八年中共的改革開放亦對「多元主義」模式提出了挑戰；八〇年代在西方學界針對行為主義所興起國家研究，史考奇波（Theda Skocpol）認為當代許多研究典範皆忽略了國家角色的探討，而七〇年代以來，各種客觀環境的發展，使得在社會科學中，一種「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轉向「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的研究典範^⑱。此亦是史考奇波疾呼「將國家帶回」（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深刻意義。

註⑯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13.

註⑰ Harry Harding, *op. cit.*, pp. 304~305.

註⑱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in Peter Evans and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7.

除此之外，許多西方學者將中國改革與東歐私有部門的出現做比較後，認為兩者走的均為一條揚棄蘇聯計畫經濟模式的「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道路，而將東歐研究模式引介到中國研究的領域中，更豐富了西方中國研究的成果^②。

在檢討了傳統模式的缺失後，許多西方學者對後文革中國的研究主題從中共精英集團或社會團體的關注，轉而重視影響精英群衆行為的制度性網絡，換言之，此時期所重視的是影響政治行為與政策產出背後的制度結構約制，此處所指涉的制度結構不單單是正式制度，還包括形構政治行為者的利益、意見與資源的政治權威，根據哈爾彭（Nina P. Halpern）的說法，就是「新制度主義」的出現^③，其中，國家官僚的運作、國家—社會關係以及大眾參與的研究為本時期的特點。描繪官僚決策與政策執行過程的代表作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與歐邁可（Michel Oksenberg）**中國的政策制訂：領導者、結構與過程**^④與藍普頓（David M. Lampton）的**後毛中國的政策執行**^⑤，歐布林（Kevin O'Brien）則認為中共八〇年代以來的全國人大改革為一種沒有自由化的改革^⑥，舒（Vivienne Shue）的**國家的滲透**^⑦則揭示了國家及農村間的關係，此外，魏昂德在其**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⑧一書中則從單位社會學討論工廠中的「組織性依附」（organized dependency）與「恩庇—侍從」（patron-client）權威關係；在九〇年代則以謝淑麗（Susan Shirk）的**中共經改的政治邏輯**^⑨為代表。以上著作所關注的焦點雖不盡相同，但都是從制度與結構論述中國的政治發展。

就理論本身而言，新制度主義的出現是源自於經濟學界對新古典經濟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的反省。新古典學派往往先預設市場的存在，而將制度（institution）視為一外生變量，其假設經濟活動中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為零，因而不重視制度因素。與此相對地，新制度學派將制度與經濟行為間的交互關係帶入經濟學研究中，其認為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一定會帶來成本，這些交易成本增加了人類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經濟表現。所以，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裡，到處可以看到制度、訊息（information）、交易成本、產權約制（constraints of property rights）和經濟成果間的關係^⑩。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新制度典範雖然

註^②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op. cit.*, pp. 1~2.

註^③ Nina P. Halpern,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David Shambaugh ed., *op. cit.*, p. 125.

註^④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g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⑤ David M. Lampt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註^⑥ Kevin J. O'Brien,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註^⑦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⑧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註^⑨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拒絕新古典經濟學的許多假設，但仍然保留了其關於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傳統。

寇斯（Ronald H. Coase）是其中的理論創始人，而諾斯（Douglass North）則開拓性地使用新制度經濟研究方法解釋了經濟制度變遷的過程^⑩。諾斯主張，如果制度是存在於零交易成本的架構中，則歷史就無足輕重；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會產生所謂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小事件的結果和機運環境能決定結局，而結局一旦出現會導致一條特定的路徑；且一種解決結果一旦達成就無法撤出，即產生一種「鎖進」（lock-in）的效果^⑪。

簡言之，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的意義就是藉著對財產權的重新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減少此種交易的不確定性，並增加誘因機制（incentive mechanism）以增加生產效益。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意在指出歷史的重要，我們若不追溯制度逐步累積的演變，就無法理解今天的決策。

根據倪志偉的觀點，從社會學發展的脈絡看來，社會學三大家均對新制度典範有所貢獻。涂爾幹（Emile Durkheim）從方法論的集體主義（holism）出發，強調社會秩序對個人選擇的制約作用（choice within constraint），韋伯（Max Weber）在經濟與社會中則開展其歷史社會學，其認為理性與選擇都是在既定的社會與歷史之制度架構下所完成的，而馬克思所強調的國家社會關係、產權制度以及「整全」（totality）的概念等，均給予後來的學者極大的想像與思考空間^⑫；就方法論看來，三大家所強調的理性均是在系統約制下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而此說法正與新制度經濟學不謀而合，也正是鄒讜教授所謂的「宏觀結構與微觀行動的結合」。

鄒讜教授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一書，完成於天安門事件之後，其試圖分析中國政治如何向民主轉型，以及轉型過程中的複雜性與困難性，其並提出了極具挑戰性的理論框架。在方法論上，其強調必須將宏觀歷史結構與微觀行為分析結合起來，以突破「結構決定論」思維模式給人們帶來的「虛假必然性」（false necessity）桎梏，同時將理性選擇分析帶入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這一極為複雜的歷史情境中。

鄒讜反對用單一因素去解釋政治系統的蛻變，其主張應結合微觀行為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與宏觀的「社會結構論」（Social structuralism），綜合成為一個完整人類行為與社會變遷的理論。其中，宏觀政治系統的基礎是個人的政治行動，個人政治行動是宏觀政治系統的內容，正如鄒教授所言：「理性選擇的創造性、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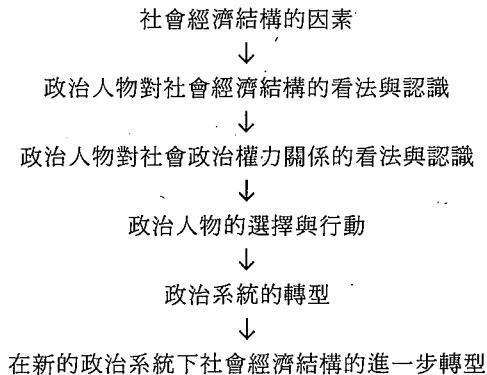
註^⑩ Thrainn Eggertsson,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

註^⑪ 可參閱諾斯的著作：*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81) 與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台北：時報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

註^⑫ Douglass North 著，劉瑞華譯，前引書，頁一一一～一二四。

註^⑬ Victor Nee, "Sourc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3~6.

性和戰略互動性就是宏觀歷史變化包括政治社會系統轉型最直接的微觀機制」^④。其相互關係如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研究員溫克勒（Edwin Winckler）在其所編著的《共產中國的轉型》一書中，從「代理理論」出發，將焦點置於具體的制度上，提供了結合「結構／行動」的理論框架，從宏觀與微觀、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靜態與動態描繪中共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轉型的軌跡^⑤，此種兼顧結構（structure）與偏好（preference）的「微觀—宏觀關聯」的多層次分析模式，便將中國研究的方法論提升到另一個新的境界。此亦正是諾思強調在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除了要摒除新古典的分析模式外，必須採用「制度／認知」途徑（institutional／cognitive approach）作為理解制度變遷的分析架構，並須同時考量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與執行三者間的互動^⑥。而此將帶給中國研究的「新制度主義」角度更明確的研究方向。

由於國家社會主義是以黨國為中心所建構出來的，故在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無法忽視其中的政治邏輯，如改革的尋租、委託代理與利益集團等問題，所以必須藉助其他的學科以釐清此種非經濟的權力關係，特別是政治學與社會學^⑦。隨著此種研究趨勢的發展，「新制度主義」已成為社會科學界中，不論是政治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等科際整合研究的典範共識。透過新制度主義所採用的途徑與概念，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一些相關的重要議題：(1) 澄清個人對政治的不同偏好；(2) 提供發展過程中正式與非正式因素的解釋；(3) 解釋制度如何產生以及如何影響發展過程；(4) 釐清在理論與

註④ 鄭謙，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〇四～二六五。

註⑤ Edwin A. Winckler, "Explaining Leninist Transitions" in Edwin A. Winckler ed.,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in China: 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 292.

註⑥ Douglass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94, p. 366.

註⑦ Penelope B. Prime,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David Shambaugh ed., *op. cit.*, p. 97.

實踐過程中的「委託—代理」(principal-agent)關係^⑧。

而我們觀察最近二十年來，美國的中國研究著作中，分析的焦點不再只著重於領導者個人主觀的願望，或各派系之間的鬥爭，其所關照的範圍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許多諸如特殊制度結構的資訊、誘因以及系絡(context)等面向，此亦正符合何漢理教授對所謂「第三代」研究者的要求。

美國中國研究典範轉移之因素

研究典範	中國國內政治發展	國際環境與美國國內政治動態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潮流
極權主義 (二次大戰後一文革爆發)	1. 採取向蘇聯「一邊倒」外交政策；引進「蘇聯模式」。 2. 一連串政治運動。	1. 冷戰方殷，兩大集團對峙。 2. 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所掀起的反共風潮高漲。	古典政治學理論
多元主義 (文革一毛澤東去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越戰及其引起關於美國國家定位的反思	行為主義風行
新制度主義 (改革開放一)	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	國際兩極格局的鬆動	對行為主義之檢討與國家主義興起

四、研究議題的評析

在新制度主義典範下的研究趨勢，明顯地從意識形態、派系鬥爭或文化研究轉移到制度研究來，根據史塔克與倪志偉的觀點，其主要研究議題與分析焦點包括「層級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界線的重劃」以及「改革循環的政治分析」等^⑨。而正由於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遷是以改革開放為主軸所開展的，故相較於傳統模式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體制及領導精英的觀察，本時期的研究則是以經濟層面為主，以及其所產生的政治影響與社會效應。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當代西方中國研究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研究焦點，其中也隱含著改革與制度轉型的時間序列：

(一) 改革路徑選擇

論者常謂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來的改革為「漸進主義」(gradualism)，蘇東等國家為「激進主義」(radicalism)或「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而兩種改革方式的結果是中國大陸的「摸著石頭過河」明顯優於蘇、東歐所採取的「大爆炸」(big

註⑧ Clack Gibson, "Development,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p. 5.

註⑨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op. cit.*, pp. 16~26.

bang) 改革方式^⑩。而既然同為社會主義國家，都曾是黨政一元化，採取史達林重工業發展模式，為何會採取不同的改革路徑？

不論就蘇東或中國大陸的經驗看來，在改革所觸動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原先的計畫官僚基於意識形態與自身的既得利益考量，往往會站在反對改革的立場，而成爲推動改革的障礙，面對此，改革者有兩種選擇：一為在進行經濟改革前先進行政治改革，以剷除擋路的官僚；另一是在不觸動官僚階級權益的情況下，另外開闢一個與計畫體制平行的經濟機制，繞開擋路的官僚。而蘇聯與中國大陸由於改革初始條件的不同，使其作了不同的路徑選擇。

謝淑麗在《中共經改的政治邏輯》一書中認爲，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大躍進與文革期間，毛爲了政治鬥爭（對抗復辟的官僚主義）而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較前蘇聯東歐重要，這就造成了中國大陸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結構的差異^⑪。而戴慕珍（Jean Oi）亦持類似的觀點，她認爲由於毛時代所主張的「塊塊專政」結構，使地方擁有相對的自主權^⑫。此外，根據裴敏欣（Minxin Pei）的分析，其認爲中國大陸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完全程度不若蘇聯，故能採取較爲彈性的部份改革策略^⑬。換言之，中國大陸在進行改革之前，由於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特殊的政治發展以及對蘇聯重工業模式的反省，其早已「遠離國家社會主義」（away from state-socialism）。

而正是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具相對自主性以及中國從來就沒有建立起像蘇聯那樣嚴密的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使得中國大陸在改革路徑的選擇會不同於蘇聯的震盪療法。鄧小平深知此種客觀結構形勢，在不觸動政治體系情況下，採取了聯合地方勢力以鞏固其政治權威，並進行市場經濟改革^⑭。亦即在改革的關鍵點上，鄧不像戈巴契夫企圖通過政治改革以剷除經濟改革的障礙，而是繞過身爲既得利益者的共黨官僚，採取局部的、逐步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動員對改革有所期待者的參與和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改革的阻力，此即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換言之，改革政策的選擇是「路徑依賴」的結果。而就中國大陸的實踐看來，鄧小平時代經濟改革的成功正是建立在毛澤東時代中央與地方關係「條塊」關係結構轉變的「初始條件」上^⑮。

註^⑩ Ronald I. McKinnon, "Gradualism Versus Rapid Liberaliza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4), pp. 63~94. 而中蘇改革的異同點，可參閱：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

註^⑪ Susan Shirk, *op. cit.*, pp. 4~18.

註^⑫ Jean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pp. 1132~1149.

註^⑬ Minxin Pei, "Microfoundations of State-socialism and Pattern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29, no. 2 (June 1996), p. 142.

註^⑭ Susan Shirk, *op. cit.*, p. 14.

註^⑮ 溫治溢，「論中共的漸進主義改革——制度典範分析」，東亞季刊（台北），第二十七卷第三期，頁九〇~九一。

就此而言，中共改革的路徑選擇不僅僅是個人意志的決定，也非派系鬥爭後的結果，還必須參照其歷史結構因素，此也正是羅斯基（Thomas Rawski）在研究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改革後所強調的，解釋中國改革必須從歷史入手，考慮改革的初始條件，才能更貼切地瞭解各種制度實施的相互作用^⑯。

（二）鄉村工業成長的動力

八〇年代與九〇年代初期，中國改革的經濟成就帶給西方學者極為豐富的研究素材，尤其是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使研究者亟欲探索其制度根源。

就當時制度環境而言，計畫經濟的實施再加上歷經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民生物資的短缺成為突出的問題，提供了農村社隊企業發展的機會，換言之，科奈爾（Janos Kornai）對國家社會主義所描繪的「短缺經濟」（shortage economy）現象正是八〇年代中國鄉鎮企業發展的主因^⑰。此外，中國擁有龐大勞動力也提供鄉鎮企業絕佳的發展基礎^⑱。

除此短缺經濟與勞動力過剩這兩項制度遺產外，西方學者多將研究焦點集中在財產權（property right）變革上，就西方發展經驗而言，產權明晰（私有化）方能界定權責，提高組織運作的效益，然而，中國鄉鎮企業卻是在產權模糊的情況下迅速發展，面對此種幾近顛覆制度經濟學的事實，許多學者認為，多數企業都是戴著「紅帽子」的「假集體」，故鄉村企業成長的來源是集體企業「隱藏性私有化」（hidden privatization）、「非正式私有化」（informal privatization）的過程，看似集體，實則為私人藉由承包、承租等形式來經營，故私營部門在中國經濟中被嚴重低估了，而此種「隱藏性私有化」才是鄉村工業成長的原動力^⑲。

國內學者吳玉山教授認為在中國產權過程中，經濟逐漸分成兩個部份，一個是國有部門，在這裡改革的方向是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也就是有市場化而不私有化；另一方面是非國有部門，這裡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與隱藏性的私有化，然而真正的市場機制並未形成^⑳。從下圖來看，正由於國家分別透過對於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與控制權來導引國民經濟，中國大陸才未出現蘇聯東歐等國因改革所產生的通貨

註⑯ Thomas Rawski, "Chinese Industrial Reform: Accomplishment,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 1994, pp. 271~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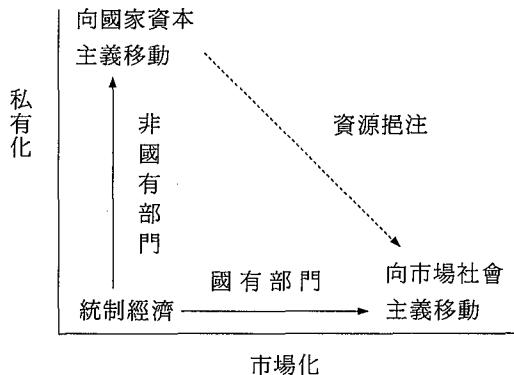
註⑰ 關於科奈爾的觀點，可參閱：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註⑱ 關於勞動力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可參考：William Arthur Lewis, 「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收錄於郭熙保，發展經濟學經典論著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一二二～一六八。

註⑲ Ole Odgaar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Rural China* (Hants, England: Avebury, 1992)、Susan Young, *Priv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N.Y.: M. E. Sharpe, 1995). 轉引自陳志柔，「經濟改革與社會後果：回顧西方學界對於中國大陸制度變遷的研究」，發表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變遷：社會科學的回顧與前瞻，中央研究院大陸研究推動委員會與民族學研究所合辦，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舉辦，頁 I ~ 一~五。

註⑳ 吳玉山，「回顧中國大陸產權改革」，香港社會科學學報（香港），一九九九年夏季，頁一八三。

膨脹與經濟危機。



相對於上述私有化論者的說法，戴慕珍與魏昂德則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運作中最大的難題不在企業公有制上，其認為縱使是集體企業只要市場能提供誘因，就能產生經濟效益。戴慕珍的「地方政府經濟法人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概念正是立基於這種觀點，其認為發生在東亞國家中「管理市場」（Governing the Market）與「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的概念^①，同樣地發生在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與地方企業的互動關係中，亦即地方政府在促進農村快速發展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其認為由於毛澤東時期所留下的制度遺產（官僚網絡與強勢的政治權威）使得改革以來地方政府能積極介入地方企業的發展，而鄉鎮企業之所以能快速發展，乃得力於縣、鄉鎮與村政府的企業家創業精神，地方政府提供集體企業原始資本，協助企業發展，運用政治權威動員資金投資、信用擔保以及提供市場訊息與技術^②。換言之，地方政府運用了政治與經濟雙重權威，解決企業的問題，增加集體企業的比較利益，提升地方產業發展，故地方幹部權充了企業家的角色，肩負了政治與經濟風險^③。

關於中國經濟成就的解釋，不論是短缺經濟、龐大的勞動力、產權私有、政府的角色或是放權讓利提供誘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等，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均具有一定

註^① 其認為政府與經濟發展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主要有四項特點：(1) 由一群政治、官僚的菁英份子持續領導，避免經濟不穩定的政策出現；(2) 在全面性計畫機構引導下，公私部門密切合作；(3) 注重教育投資和財富重分配等政策；(4) 在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下，政府主動干預經濟。關於「發展型國家」，可參閱：Meredith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② Jean C. Oi, "The Evolution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Andrew G. Walder ed., *Zouping in Transition——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2~85.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註^③ 張弘遠在四川的田野調查研究中發現由於各地制度遺產的影響再加上地區間發展的差序格局，政企關係會依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差異以及政企間的策略互動而有所不同，且產權改革未必能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因為中國大陸的產權並非是市場運作的結果，而是政經互動的結果），經濟永續發展的關鍵將在企業面對市場的競爭能力。參見：張弘遠，「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中後發展地區的政府角色與企業行為」，東亞季刊（台北），第三十一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九年一月，頁五一~九〇。

的解釋力，而就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各自掌握了中國大陸發展的不同研究切面。

(三) 經濟改革與社會後果

中國經濟改革在社會各個層面逐漸產生了程度不一的制度後果，其中影響最深遠的，就是不平等結構和社會階層化機制的改變。關於此，許多西方學者在觀察東歐市場發展後提出了極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東歐學者慈蘭尼（Ivan Szelenyi），其在著名歷史社會學家伯蘭尼（Karl Polanyi）的研究基礎上認為匈牙利從社會主義體制轉型到市場經濟，總共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重分配整合經濟的地方市場、社會混合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導向經濟等，每種經濟制度所強調的分配制度不一樣，其為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等的基礎，換言之，階級分化鑲嵌在宏觀的經濟體制運作中，不同利益的衝突都隱藏在經濟交換的過程^{④4}。

倪志偉則借用了慈蘭尼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國式的「市場轉型理論」（market transition theory），企圖說明市場制度對於中國社會不平等和社會階層化的影響，其有以下兩個基本假設：(1) 將以供需關係和價格機制為特徵的「市場制度」，和以中央集權官僚體系的「再分配制度」視為對立的資源分配邏輯；(2) 從「再分配」過渡到「市場制度」的過程中，必然引起社會分層體系的規律性變化，而隨著市場化與私有化的發展，不僅增強生產體系的經濟效益，更突破了官僚壟斷分配資源的權力，如此，市場提供了社會底層的直接生產者與農民翻身的機會，官僚則會逐漸喪失其原有的優勢，而市場轉型的結果，將使社會分配趨於平等^{④5}。

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不僅受到西方中國研究者的關注，亦引發了美國社會學界對此議題的爭辯，此直接導致美國社會學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在一九九六年八月號以此為專題開展了一場關於中國「市場轉型與社會後果」的大辯論，不少學者質疑倪志偉的論證與研究成果，而與倪志偉系出同門的史塔克，其東歐轉型研究所強調的「路徑依賴」正好成為學者補充倪志偉「市場轉型」的素材^{④6}。慈蘭尼在還原其理論後認為，倪志偉的市場概念過於籠統，市場轉型有其階段性，而倪的市場轉型理論只適合解釋「重分配整合經濟的地方市場」這個短暫的階段，此外，必須

^{註④4} Ivan Szelenyi and Eric Kostello, "Outline of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Inequality: the Case of Socialist and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 *op. cit.*, pp. 305~326.

^{註④5}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54, 1989, pp. 663~681, and Victor Ne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56, 1991 (June), pp. 267~282. And Victor Nee,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1996 (August), pp. 908~949.

^{註④6} David Stark 的論點可參考其獲得一九九九年全美最佳社會學著作：David Stark and Laszlo Ruszt,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將幹部區分為掌握政治權力運作者與技術官僚，在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經濟體制中，雖然市場為社會分層的動力，但由於路徑依賴的結果，原有的技術官僚仍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獲得極大的利益，更加深社會的不平等^⑦。此外，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則是以政治與市場：雙重轉型為題，說明政治與路徑依賴等在市場改革中的重要性，其認為在市場轉型過程中亦存在著政治市場，不同部門與人群間的政治關係中往往存在著議價機制，換言之，市場轉型的制度形式不只是經濟現象，而是有其政治邏輯的；在實證研究方面，其一方面肯定倪志偉針對市場發展與人力資本經濟回報間的正相關之主張，另一方面則反駁倪志偉關於幹部權力與收入的論述，白威廉認為掌握權力的幹部其所獲得的經濟回報都是正面的，故幹部的收入優勢一直是存在的^⑧。而魏昂德則批評倪志偉自詡為制度論者，但在其市場轉型的研究對產權與相關制度的探討卻是付之闕如，且將經濟成長與市場發展混為一談，再加上忽略政治因素的結果，使其理論與現實的斷裂愈加擴大^⑨。

針對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兩岸學者亦從實際的田野調查經驗中提出不同的觀點，其多認為倪志偉只觀察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表面現象，對官僚幹部利用市場機會進行尋租行為視而不見，且此種錢權交易更加惡化了原有體系中的不平等現象，並非如市場轉型論所宣稱的促進社會平等，同時其亦忽略地方政府在財政誘因下以極其昂貴的代價推動地方經濟發展^⑩。換言之，市場轉型論忽略了在位者的權力優勢與再生能力，市場改革過程中最大的獲益者反而是共黨官僚體系中的幹部^⑪。

(四) 國家—社會關係

「國家—社會」關係研究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國家中心論者」認為當前的國家研究有兩種趨勢：一為將國家視為行動者，並探討「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另一為則是國家視為組織與行動的結構，探討此結構對政治之內涵與運作的影響^⑫。相對於此，「社會中心論者」則強調在現代社會中權力是分散於不同的社會團體與階級，政府也是社會體系中的一環，國家政務的推動是經由各種不同「中介性組織」的利益匯聚所折衝妥協的結果，也正因此才有多元主義者「誰統治？」的論述^⑬。就此而言，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所涉及的就是對「權力運用」的研究。

國家與社會關係一直是西方中國研究者所關切的議題，之前所列舉的論文亦都不

註^⑦ Ivan Szelenyi and Eric Kostello,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1996 (August), pp. 1082~1096.

註^⑧ William L. Parish and Ethan Michelson, "Politics as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1996 (August), pp. 1042~1049.

註^⑨ 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1996 (August), pp. 1060~1073.

註^⑩ 劉雅麗，「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制度基礎」，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會論文，二〇〇〇年五月，頁二。

註^⑪ 魏昂德、戴慕珍、邊燕傑（Yanjie Bian）等均持如此的觀點，可參閱：陳志柔，前引文。

註^⑫ Theda Skocpol, *op. cit.*, pp. 3~37.

註^⑬ Ribert Dahl, *Who Gover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同程度地觸及此問題。魏昂德認為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旗幟下，出現形形色色的研究，包括社團主義（corporatism）、侍從主義（clientalism）、政策研究、政治參與、集團政治、集體抗議，以及近年來備受關注的隱藏性抵抗、「市民社會」的興起以及「國家—社會」衝突等議題^⑭。

在極權主義的典範下，研究者將黨國機器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組織內部高度整合，利益一致，且上下級之間存在著命令與服從的關係，換言之，國家形成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三位一體的結構，其所暗示的是國家穿透社會的能力無遠弗屆。相對於此，新制度主義則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科層機構在功能上相互分割，條條、塊塊與條塊之間經常存在著張力，而討價還價通常是解決紛爭的方式，李侃如稱此為「分裂式的權威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⑮。

八〇年代以來，不少學者摒棄了意識形態與黨國中心研究，試圖用新的途徑去還原毛澤東時代的「國家—社會」圖像，其中舒的著作國家的滲透則極具代表性，其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國家官僚的行政能力從未直接滲透到農村基層，而是透過仕紳作為代理人，貫徹國家的統治意圖。而在中共建政後，由於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策執行，地方幹部名義上代表國家權力，實際則因出身當地，認同本土，倒可以說是「社會」的代表；到大躍進時期，毛強調自力更生，企圖建立一種融合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功能的「大而全」、「小而全」結構，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更使農村發展宛如「細胞般的社群」（cell-like communities）的蜂窩狀（honeycomb）結構，在此種蜂窩狀的農村社會，地方幹部的內向性格愈來愈明顯，這往往使得地方幹部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無所選擇，農民的支持即成為他們唯一的政治資源，當然在行為上越來越像傳統仕紳，地方幹部成為國家權力向下滲透的阻礙，對上級指示陽奉陰違，而專以保護轄區內農民的利益為重，換言之，在毛澤東時代各種政策的施行，更加強化農村成為封閉系統的細胞，表膜猶如銅牆鐵壁，根本非中共中央所能洞穿。面對此，鄧小平一上台，透過農村改革，立即將毛集體化農業倒轉，實行包產到戶，同時更恢復個體商業，試圖藉蜘蛛網狀商業關係的形成，去突破此種蜂窩狀的結構以及地方主義次文化，使國家權力滲透到農村各地^⑯。

此外，魏昂德與戴慕珍的博士論文則分別使用「侍從主義」去建構城市與農村的權力運作圖像。魏昂德利用「組織性依賴」（organized dependence）^⑰與「有原則的特

註^⑭ 魏昂德，「現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從描述現狀到解釋變遷」，收錄於涂肇慶、林益民編，前引書，頁五九。

註^⑮ Kenneth Lieberthal,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 in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gerg ed, *op. cit.*, pp. 1~30.

註^⑯ Vivienne Shue, *op. cit.*

註^⑰ Rona-Tas 在分析匈牙利時亦採用類似的概念，其認為此種由國家來統籌資源分配、安排就業的國家社會主義型態，Rona-Tas 稱之為「普遍性的國家僱傭」（universal state employment）關係，而此種關係因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改革而瓦解則是直接導致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權崩潰的主因。見：Akos Rona-Tas, *The Great Surprise of the Small Transforma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Hung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73~89.

殊主義」（principled particularism）等概念來論述中共建政後「單位社會」的權力運作，以及隨之而來的人身依附現象，其稱之為「共產社會的新傳統主義」，而工人身處在制度制約與人際關係網絡中，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依附於企業，在政治上依附於工廠的黨政領導，在個人關係上依附於工廠的上級直接領導。此一模式的主要觀點包括：(1) 指令性經濟賦予下層幹部在資源分配上的壟斷權力，普通群衆只能通過這些幹部建立庇護依賴關係才能獲得益處。如此，庇護關係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個主要紐帶。(2) 單位的封閉性以及社會關係的感情紐帶導致這種關係的穩定性。(3) 這種關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它加強了國家滲透與協調社會的能力，導致了人們對現有制度的認可，促進了社會群體的分化以及減弱社會自主的集體行爲能力^⑯。換言之，中共的單位制度具有控制與福利的雙重功能，從而達到穩定社會的效果，然而，隨著城市改革的開展，制度變遷也弱化了其中的政治影響^⑰。

魏昂德的分析使美國中國研究從強調宏觀的歷史事件、總體性的政黨結構和意識形態，轉而重視微觀社會運作以及有理性選擇能力的個人；在研究方法方面，使研究者注意到制度的制約力量，以及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在研究課題方面，其對中國大陸的「單位」、「社會網絡關係」研究，也開了風氣之先^⑱。

而戴慕珍在其當代中國的國家與農民一書中認為，地方幹部薪水非來自國家，且生活機會使地方幹部與農民形成「侍從關係」，因此，國家政策的執行大打折扣，而生產大隊幹部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一方面滿足上級，另一方面從下級獲得利益，故對生產小隊的欺瞞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形成共謀的關係^⑲。從舒、魏昂德與戴慕珍的研究可發現，其間雖有不少差異，但皆顛覆了極權主義模式的論述，即基層社會相對於國家具有自主能力。

上述的「侍從關係」在溫克（David Wank）的運用下則是頗耐人尋味，其認為中國傳統的「恩庇—侍從」關係在改革後並無崩潰，而是以新的商品形式出現，因為在產權規範與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私營企業主為確保能順利運作，必須建立與地方政府間良好的交往關係，而地方幹部這種將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計算的現象，溫克稱之為「商品化的共產主義」^⑳。此外，林南（Lin Nan）的「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更是令人注目的焦點，其主張應從以下三要素來分析改革中的經濟體制，包括（社會主義）科層協作、市場調節與地方協調，其中地方協調的角色至關重要。這樣的觀點

註⑯ 周雪光，「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評述」，收錄於涂肇慶、林益民編，前引書，頁一四九。

註⑰ Lowell Dittmer and Lu Xiaobo,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Danwei: Macr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Micropolitical Change," *China Studies*, no. 3, Spring 1997, pp. 115~122.

註⑱ 關於西方對中國單位制度的研究可參閱：Xiaobo Lu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Y.: M.E. Sharp, 1997).

註⑲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12.

註⑳ David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40.

明顯地表現在林南與陳志柔對大邱庄的調查，其描繪出在股份制的實施過程中，地方家族與精英透過宗族勢力，將產權由國家或地方集體轉移到自己的手中，而中央政府的無能為力與政策模糊更助長了產權從集體轉移到私人，而地方精英黨政企三位一體的身份，在其家族網絡背景的運作下，更是掌控了地方經濟與行政資源^⑯。基於此，林南並斷言中國不會走西方式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道路，而會由於地方性力量的強弱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發展模式^⑰。

就此而言，在新制度論者的筆下，「侍從主義」、「宗族力量」以及地方利益的複雜結構均使國家向社會的滲透受到阻絕。魏昂德認為在改革已逾二十年的今天，國家不再獨斷所有生產資料，農業的非集體化、地方政府企業的興起，以及相應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發展有效地瓦解了國家獨斷的根基；新的所有制形式興起還意味著國家對就業機會的控制被削弱了；另外，黨組織也不再像毛時代一樣要求其成員保持高度的忠誠和嚴格的紀律，國家不再尋求以激進的方式改造社會，而是承擔維持社會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的職責^⑱。

然而，當研究者將「理性」與中國經改劃上等號的同時，中共對待八九天安門民運與近年來法輪功事件的手段，讓人不禁產生了「極權主義模式是否仍適用於中國」的深省。關於此，劉雅靈在研究溫州私營經濟起源所得到的結論則相當具啟發性，其認為中共的國家能力從建國以來其實一直是相當弱的，其中存在著主觀控制意志與客觀控制能力間的落差，正因為國家行政能力不足，故其只能選擇性、間歇性地運用其專制力量去鎮壓異己^⑲，而由於放權讓利與私營經濟發展所形成的由下而上之改革，更加強化這種格局，劉教授稱此種國家政體的形態為「間歇性的極權主義」（sporadic totalitarianism）^⑳。

面對中國大陸複雜的發展圖像，薩奇（Tony Saich）也承認中國的確是一個多種「國家—社會關係」研究模式可同時適用的國家，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扮演掠奪

註^⑯ Lin Nan and Chih-jou Jay Chen, "Local Elites as Officials and Owners: Shareholding and Property Rights in Daqiu Zhuang" in Jean Oi and Andrew Walder ed.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01~354.

註^⑰ 宋林飛，「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社會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二〇〇〇年第五期，第五五頁。

註^⑱ 魏昂德，「現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收錄於涂肇慶、林益民編，前引書，頁六九。

註^⑲ Michael Mann 在其社會權力的起源一書中將國家權力區分為「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與「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前者指的是一種分配力量，國家執政者可不經由社會的同意而遂行其意志，後者指的是國家貫穿、滲透社會的力量，其透過組織的建構與政策制定去協調人民的生活，而現代國家的特徵即是「基礎能力」的增強，在對社會的滲透、影響社會生活的能力增強後，能使人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愈強；而除了基礎建設外，國家亦介入經濟發展、社會福利以及人民生活，政策可滲透到領土的角落，擴張對社會的介入。參見：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4~63.

註^⑳ Yia-Ling Liu, "The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0, 1992 (June), pp. 293~316.

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國家又扮演發展者的角色^⑧，一方面一些社會組織具有和國家議價的能力，一方面又看到其與黨國體制關係密切，一方面看到具有形成「市民社會」的條件，另一方面又發現其鑲嵌在國家之中^⑨。而此種分散與複雜的圖景正是中國研究者爭論不斷的源頭，也正是中國研究引人入勝之處。

(五) 政治發展前景

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始於一九七四年南歐的民主化浪潮，隨後越洋湧進拉丁美洲及亞洲地區，並在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政權相繼崩潰，緊接著蘇共亦隨後瓦解而達到頂峰^⑩。而隨著中國大陸持續地改革開放，學著亦將研究焦點鎖定在中國，其間雖因天安門事件而中輟，但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所掀起的另一波改革高潮與決定加入世貿組織，又吸引了研究者的期待與關注。

一般討論民主化條件的理論，可概分為結構／行動二元範疇，從結構的觀點出發，威權轉型是基於與其政權相關或相互依存的結構發生變動所致，此觀點所討論的議題包括「政權體制的結構變化」、「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關係」以及「國際政經因素」等；從行動的角度出發，政權轉型的研究對象則落在政體內部的主體——行動者，其中統治精英以及朝野政治行動者的策略互動自然成為研究焦點^⑪。然而，就後者而言，中國目前並無挑戰共產黨的有力組織性反對團體，研究者也不會去期待中國出現一個為中共掘墓的戈巴契夫式領導，故自然地將期待落在結構的變遷。

吳玉山教授在觀察了關於中國民主發展的研究後，歸納出兩種相對的研究典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與霸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前者最重要的命題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與民主化，而後者則認為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高速經濟發展會鞏固威權統治，壓抑民主力量^⑫。霸權穩定論從拉丁美洲與東亞國家如南韓、新加坡與台灣吸收養分，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的是「穩定壓倒一切」，政治運作形式就如歐唐尼爾（Guillermo O'Donnell）所謂的「官僚威權統治」（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⑬，其最明顯地表現在「新權威

註^⑧ Peter Evans 在其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一書中將國家區分為「掠奪型」、「發展型」與「中間型」三種形式去檢視發展中國家對經濟轉型的作用。參見：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⑨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April 2000, pp. 138~139.

註^⑩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註^⑪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5.

註^⑫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 VS. 政權穩定理論：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台北），民國八十七年六月，頁四四三~四六四。

註^⑬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3).

主義」的提倡，而這股風潮也隨著趙紫陽的下台而淡化。

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制度變遷的研究有以下四個方向：全國人大的改革、中央地方關係的演變、農村基層民主的實施以及政府機構改革的分析等^⑧。而深究其中，都隱含著對中國民主化的期待^⑨，其中如歐布林與李連江對中國農村選舉的觀察，其認為村委會選舉不僅提高了村長相對於黨支部書記的地位，也改變了村與鄉鎮間的關係，其增加了廣大農民政治參與的意願，也使此種基層民主形式有擴散的趨勢^⑩。此外，魏昂德則認為，中國遠離中央計畫經濟邁向市場經濟的後果便是政治衰敗，因為列寧式政權必然受經濟改革的侵蝕，弱化了基層組織中的「恩庇—侍從」關係聯結，產生了對人民控制的鬆動，其認為這是一種由內部所產生的寧靜革命^⑪。

回顧二次大戰結束時，中國大陸被視為「敵對國家」，故極權政治成為其唯一的特徵；七〇年代以前，衆多西方學者深受「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對社會主義所揭露的「平均主義」有所嚮往，造就了所謂的左派學者，他們的動機與想法，賀藍德（Paul Hollander）在其名著《政治朝聖者》一書中有精闢闡釋，而及至文革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前述的偏差觀點立即為另一項偏差所取代：亦即中國大陸有廣大市場、潛力無窮，理性的改革開放可能使中國大陸滑向資本主義。而此種經濟市場化、私有化必將帶來政治民主化的論調可以懷德（Gordon White）的騎虎難下為代表^⑫。

在此種現代化理論的氛圍下，一種最為明顯的論述就是以西歐經驗為本，認為獨立而強大的中產階級為實現民主的必要條件^⑬。而中國的經濟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財富與權力重組，造就出一批所謂的「新中產階級」，其所帶來的政治社會效應，就是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出現。但此種觀點遭受不少研究者的批評，因為就實際狀況而言，中國新中產階級是在缺乏社會多元化的狀況下出現的，其中黨國扮演重要的政治社會影

^{註⑧} 徐斯儉，「中國大陸九〇年代之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發表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變遷：社會科學的回顧與前瞻，中央研究院大陸研究推動委員會與民族學研究所合辦，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舉辦，頁I ~二~二~六。

^{註⑨} 關於此，趙文詞在其中國與美國的幻夢一書中大膽地對於西方的中國研究作了十分徹底的反省，依照趙文詞的說法，西方中國通對中國的研究，其實只是在表述他們對自己社會的期望，他們心中關切的是自由主義，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不是中國，美國人對中國的意像（Images），是依據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來描繪；中國通對中國的期望也無異是早期傳教士救贖心態的翻版。參見：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註⑩} Lianjiang Li and Kevin O'Brien, "The Struggle over Village,"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⑪} Andrew Walder,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註⑫}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註⑬} 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⑭}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響力，而很明顯地，中國以黨國為核心的改革所產生的新中產階級，是由前國家社會主義體系中產生，其為經濟轉型的領導者，不只維持與黨國體系的聯繫，並在此種聯繫關係上開展成功的企業活動，故許多經濟活動皆鑲嵌在黨政軍體系之中。故在政治上，新中產階級與黨國體制關係密切，極少有結構性的對抗，隨著社會與政治的開放，兩者將會形成更緊密的利益共同體^①。

除了本文所列舉的五大主題外，隨著中國大陸即將加入世貿組織，「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互動的相關著作則成為研究的新趨勢。而從學科分際的角度觀察，雖說二十年來中國制度變遷的根源是經濟改革，但為何鮮少出現「純經濟」的論述，而是援引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關於此，本文認為，由於社會主義實踐所留下的制度遺產，使得黨國勢力的「慣性」仍很強，且因傳統文化的制約，使得經濟運作中存在著許多非經濟因素，故政治經濟學(polynomial economy)與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自然成為學者觀察中國制度變遷的工具，此亦即為何政治學中的「權力」(power)、「官僚」(bureaucracy)、「統治」(governance)以及社會學中的「鑲嵌」(embeddedness)、「網絡」(network)與制度等概念，不時出現在經濟運作的論述之中，因此，跨學科的研究則成為必然的趨勢，其不僅提升了理論解釋現象的能力，也豐富了中國研究的成果。

五、關於中國研究的省思——代結論

社會科學與區域研究間到底孰輕孰重始終是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②，五十年來西方中國研究隨著整個主客觀情勢不斷的轉移，亦與社會科學理論形成一種辯證性的對話，而中國過去二十餘年的變遷經驗，也相當程度地提供學者去修正與反省社會科學理論的機會。吾人認為中國大陸改革二十餘年，的確是在走一條「遠離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不見得就是「邁向西方資本主義」之路^③。慈蘭尼在其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建構一書中即認為，以東歐轉型的經驗看來，社會主義轉型為資本主義與西方古典經驗中由封建主義轉型為資本主義是迥然不同的，在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中，制度與舊有習慣的辯證互動，形成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圖像，此並非以「理性預期」的主流經濟學所能詮釋的^④。同樣地，中國研究亦是如此，這也是本文強調政治經濟學、經濟社會學等科技整合研究的重要性。

筆者在一次和中國社科院社會所學者訪談的經驗中，其針對西方與台灣研究者提

註^① David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41~261.

註^② Lucian W. Py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 in Lucian W.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 p. 4.

註^③ 陳志柔，前引文，頁1~16。

註^④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Verso, 1998), pp. 1~45.

出了發人深省的批判：「西方學者常在通篇的經驗研究與推論中得出在中國社會『鑲嵌』、『網絡』與『關係』的重要性，但就中國人而言，這是中國社會運作的基礎與前提，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又何必大費周章地進行研究？」^⑤故不應削足適履地用西方的尺度來簡單裁量中國經驗，而是如何從中國的經驗出發，與西方社會科學進行對話，此亦正是柯保安發人深思的「中國中心主義」之主張^⑥。除此之外，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也是豐富中國研究極佳的切入點，一方面將中國視為後社會主義國家，而與前蘇聯與東歐國家轉型進行比較，另一方面則將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與拉美、中東和東亞國家進行比較，相信其研究成果將會為社會科學做出更多的貢獻。

就九〇年代以來西方中國研究的發展看來，一大批大陸學者不斷地在西方學界嶄露頭角，其不僅對西方中國研究產生衝擊，亦與西方學者形成良性的競爭關係，另一方面，大陸學術界的開放，使本土學者得以和西方學界有頻繁的交流機會，兩者均使西方中國研究有了新的發展空間。而就台灣的中國研究而言，早年因政治氣氛與資料來源的稀缺，使得中國研究附屬於情報與敵情研究的一環，但即便是如此，老一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僅對開發中國研究有極大的貢獻，也突顯出台灣的中國研究具有別於西方研究的特色。而隨著時序的轉移，吾人明顯發現國內對中國研究的興趣與能力大幅提升，一個以社會科學為對話對象的學術社群已悄然形成，其透過與西方和大陸學界間的三角互動，以及實地的田野調查研究和經驗分享，不論就理論或實際而言，這都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結果。

「中國研究下一步的方向何在？」相信這是許多研究者心中的疑惑，就中國實際發展經驗看來，不論是改革前或改革後，社會經濟以政治權力為載體的情況特別明顯，這也是為何不論是經濟改革、侍從主義、宗族力量或基層選舉等研究，都以黨國體系為鑲嵌對象之故，然而，在經歷制度轉型、制度創新後中國未來發展的圖景為何？筆者相信，社會力量的興起以及加入世貿組織在即，「社會」與「全球」面向將是研究者無可迴避的課題，而內外因素的合力，將使變遷的速度產生乘數作用，其所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效應，也將為中國研究帶來新的理論方向。

* * *

^{註5} 與中國社科院社會所學者訪談，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研究院。

^{註6} 參見：Paul A. Cohen 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崛起（台北：稻鄉圖書公司，民國八十一年）。

An Analysis on the Neo-Institutionalist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hina Studies

Hsin Hsien Wang

Abstract

For half a century, the research models used in western China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distinct trends :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plur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neo-institutionalism. Thomas Kuhn's so-called "paradigm shift." Rather than an exclusive focus on party and state elites, the ne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pens up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state as arenas of research. Thus social networks, markets, local-leve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terest groups become objects of study. The source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economic reform, but the legacy of state socialist experience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force researchers to pay attention to non-economic factors.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approach, resulting from a similar trend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borrows largely from the adjoining disciplines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Under the new paradigm, there are five new research issues in the field of China studies: why China has chosen gradualism, why rural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ssues regarding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al effect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Such research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building of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but also sets an example for Taiwan's China studies.

Keywords: paradigm shift; totalitarianism; pluralism; neo-institutionalism;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